

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： 以北京大學為例

• 王友琴

從「反右」到「文革」，從1957到1966，相隔九年。二者之間有甚麼關聯呢？

反右和文革都造成了大批受難者。北京大學反右劃了716名「右派份子」，文革中有63人被迫害致死。其他學校相仿。清華大學劃了571名「右派份子」^①，文革造成了58人死亡^②，受難者中至少有2人是「右派份子」。北京農業大學劃了143名「右派份子」，全校13.4%的教授、副教授及4.7%的大學生被劃成「右派份子」^③，文革有30人被迫害致死。各學校受迫害人數呈現明顯的均勻分布現象，顯然由於反右和文革都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。而北大因其「最高學府」的特別地位，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當了雙重角色：一方面是打擊對象，有大批師生員工遭到殘酷迫害，另一方面又是迫害樣板，中共中央多次發出內部文件或者通過報刊文章，把北大的做法介紹給全國效仿。這種情況使得北大作為一個案例極具代表性，因而也更值得分析和解釋。

本文以北京大學為案例，從受難者角度作出敘述和分析。從這一角度切入，不但出於尊重人的生命和權利的基本價值，也因為只有了解受難者才能更加深入地認識這兩個大事件^④。事實表明，北大「右派份子」作為一個群體，在文革中受到更為深重的迫害，有一批人被害死。同時，在反右中擔任領導和積極份子角色的學校負責幹部作為另一個群體，在文革中也成為「鬥爭」對象，其中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。受難者指示出這兩場大規模迫害運動的發展軌迹：一方面是迫害手段更加野蠻，另一方面是迫害對象的人數和類別進一步擴大。

北大因其「最高學府」的特別地位，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當了雙重角色：一方面是打擊對象，有大批師生員工遭到殘酷迫害，另一方面又是迫害樣板，中共中央多次發出內部文件或者通過報刊文章，把北大樹為全國樣板。

一 「右派份子」在文革中受到更深迫害

在1957年「反右派運動」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歷時三個月的「反右補課」中，北京大學有589名學生和110名教職員，一共699人，被劃成了「右派份子」；後來又再「補劃」，一共劃了716名右派份子^⑤。另外，據1979年《人民日報》上的一篇文章，北大劃了715名「右派份子」^⑥。因為官方沒有公布被「劃」者的名單，所以現在不清楚這一人之差是如何產生的。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8,983人，

教職員人數是1,399人。北大總人數的7%被劃成了「右派份子」。教職員中的「右派份子」比例高於學生接近10%。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。

「反右」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懲戒機制。首先，權力當局以言論定罪，把一大批人「戴上右派份子帽子」並進行各種懲罰，儘管這些人並沒有違反法律，也沒有危害他人。第二，本來學校能作的最高處罰不過是開除學生學籍或者解僱教職員。學校的學生或教員若有刑事犯罪，只有司法系統才可審判。但是北大當局把七百多名教師學生劃為「階級敵人」，這是人類學校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權力。第三，不但實行懲罰，而且懲罰不設定限量。一批「右派份子」被學校直接送去無限期「勞動教養」，以致他們失去人身自由長達二十年。「摘帽右派」也仍然是一個壞身份。

文革中，北大新權力當局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」具有比原來的中共北大黨委更進一層的權力。1966年，他們在校園裏建立了龐大的「勞改隊」，強迫所謂「牛鬼蛇神」在學校裏「勞改」，而且把他們剃了頭髮，對其中的女性則剃去半邊頭髮（有專用名詞稱為「陰陽頭」），命令他們在胸前懸掛寫有罪名和畫上紅叉子的姓名的牌子。1968年，他們在校園裏建立了關有數百人的監獄，俗稱「牛棚」，因為那裏被關的人被稱為「牛鬼蛇神」。「右派份子」是最早被列入「牛鬼蛇神」的群體之一。一旦成為「牛鬼蛇神」，不但失去人身自由並遭到各種侮辱，而且常遭到毆打和酷刑。在北大文革的63名受難者中，有4人是被紅衛兵學生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，連「揭發」、「批鬥」、「定性」這些「革命程序」都不曾有過，殘忍野蠻，達到了新的高峰。

「右派份子」在文革前已經遭迫害九年，再加上文革十年，文革結束後又過了兩年才得到「摘帽」和「改正」，全程長達二十一年。在筆者的採訪中，一名自己並非「右派份子」但同情「右派份子」的受訪者使用了一個說法，叫做「右派表情」，意思是當過「右派份子」的人臉上有一種特別壓抑的表情，明顯使人能覺察得到，連他們得到「改正」以後都依然還在。這種「右派表情」，是長達二十一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後形成的。下文敘述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。

在筆者的採訪中，一名受訪者使用了一個說法，叫做「右派表情」，指當過「右派份子」的人臉上有一種特別壓抑的表情，明顯使人能覺察得到，連他們得到「改正」以後都依然還在。

（一）被判死刑

在北大的716名「右派份子」中，有5名在文革中被冠以「反革命罪」判處死刑。在反右時期已有1名「右派份子」黃宗奇（哲學系學生）因與看押他的學生發生身體衝突而被判處了死刑（事實上並無人身傷害發生）。一共有6名「右派份子」被判處死刑，佔全部716人的近百分之一。這個死刑人數，不但佔北大「右派份子」群體非常高的比例，對任何一個學校來說也是非常高的比例。

五名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的「右派份子」是：

中文系學生林昭，1954年入學，1968年被處死；

數學力學系教師任大熊，1955年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，1970年被處死；

西語系學生顧文選，1956年入學，1970年被處死；

歷史系學生沈元，1955年入學，1970年被處死；

化學系學生張錫鋸，1954年入學，1976年被處死。

其中林昭為女性。1968年4月29日她在上海被處死。那是「五一節」前，「上海市革命委員會」把一批「反革命份子」「宣判死刑立即執行」（《解放日報》當時的報導語）。這是文革期間「慶祝」節日的方式。

顧文選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處死刑。1970年2月21日「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」發出一份材料，把「顧文選等55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」，要「革命群眾」「提出處理意見」。沈元也在這份材料中。55人中北大「右派份子」佔了二人。這種做法的目的之一是在普通人中製造更大恐怖，起殺一儆百的效果。這份材料發出僅僅兩個星期後，1970年3月5日，他們被處死。

任大熊1970年3月28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處死刑。1957年，他把北大圖書館英文《工人日報》上赫魯曉夫(Nikita S. Khrushchev)揭露斯大林殺害無數俄國人的所謂「秘密報告」翻譯了一些段落，手抄後貼在學校閱報欄上供大家觀看。他被劃成「右派份子」後又被判刑，在文革中再被判處死刑。從筆者收集到的判決書上可以看到，判處任大熊等13人死刑，沒有援引法律依據，只寫着：

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「照辦」的「一·三一」指示，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，加強戰備，保衛祖國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，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，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准，特依法判決如下：……

所謂「一·三一」指示，是指毛澤東批准發出的「中發〔1970〕3號文件」，題為《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》。毛澤東在此文件上批的「照辦」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。這是人類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。

(二) 被迫害致死

由於尚未能對全部716名「右派份子」的下落作追蹤調查，下文記述的僅是留在北大校園中的「右派份子」的遭遇。在文革中，北京大學有63人被迫害致死。受難者中有四人——英文教授吳興華、歷史學教授向達、中國革命史教師許世華和圖書館學教授王重民，曾在反右中被劃為「右派份子」，遭到降薪降職處分^⑦。

吳興華和向達在文革一開始就被「揪出來」進了「勞改隊」。1966年8月3日，吳興華在北大西門內辦公樓前「勞改」時，被強迫喝了水溝中從附近化工廠流出的污水中毒昏倒。紅衛兵斥責其為「裝死」。當天夜間吳興華死亡，時年43歲。死後還被剖屍，不是為了醫學目的，是紅衛兵要證明他「對抗文革自殺」以便罪加一等。

向達在1966年8月遭到殘酷「鬥爭」，在毒日頭下跪在系辦公室二樓陽台欄杆外狹窄的平台上被「示眾」。9月底，他和歷史系其他「牛鬼蛇神」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勞動，晚上他們被反鎖在一個大房間裏，連夜間出門上廁所都不准。向達有腎病，排不出尿，全身浮腫，卻不准送醫院救治。他在11月10日去世。

他們是名教授，反右時吳興華從三級教授降為五級，向達從一級教授降為二級。他們在文革前夕的處境，比起其他「右派份子」來說算是有很大特權的，但文革一開始，他們首當其衝，被革命的鐵輪輾碎。

「一·三一」指示是指毛澤東批准發出的「中發〔1970〕3號文件」，題為《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》。毛澤東在此文件上批的「照辦」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。這是人類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。

許世華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殺，王重民在頤和園後山上吊自殺。他們的死其實不能被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「自殺」。他們是在遭受了肉體和精神的重大創傷之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(三) 被判刑

文革中北大不但有一大批教員、學生和幹部被關在校園「牛棚」中，還有人受到更重的迫害，被關入國家監獄。其中有數學力學系「右派份子」程慶民，他被判刑二十年。

程慶民1949年考入北大。他和同班同學王信中、劉品馨三人都留校任教。1957年王信中寫大字報批評當時人整人的風氣，首先被定為「極右派」。程慶民是該系的中共總支委員和共青團書記，原是反右領導圈子裏的人。他在會議上不同意把兩個學生劃成「右派份子」，被指控為「包庇右派份子」，被「補劃」為「右派份子」，開除共產黨籍，降職降薪，在校中和郊區農村勞動三年。

文革中，程慶民進而被指控為「反黨集團份子」和「現行反革命」。他曾被綁在學生宿舍的雙層牀上，雙腳離地，遭到毒打。1969年，他被作為「拒不坦白」「抗拒從嚴」的典型，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的「鬥爭會」上被宣布逮捕。判刑前他和一批被捕者戴着手銬腳鐐，送到北京各個地方殘酷「批鬥」。判刑後他在山西汾陽服刑，毛澤東死亡兩年後他被釋放。

劉品馨是三個同學中唯一沒有被劃成「右派份子」的。她在日記中對兩名同學被劃為「右派份子」寫下了疑問。文革中日記成為定罪的根據^⑥，劉品馨因此長期遭到「鬥爭」。她曾跪在地上被揪住頭髮打耳光——這樣的暴行當時可以在北大當眾進行。劉品馨後來精神失常。程慶民出獄時，她已經喪失記憶不認識程了。1996年劉品馨在孤獨中去世，時年65歲。

(四) 「中右」也成「敵人」遭到暴力迫害

反右中北大還有842名未戴「右派份子帽子」而遭受各種處分的人。文革中這些人大多「升級」成為「牛鬼蛇神」遭到「鬥爭」和毆打。例如，化學系教授傅鷹（1902-1979），1952年在「思想改造運動」中曾在全校會上作為正面典型發言，1957年被劃為「中右」（意即在其右邊的人就要劃成「右派份子」），文革中則成為「牛鬼蛇神」，遭到關押和毆打。傅鷹的身份變化，正顯示了劃分「敵我」的標杆不斷左移，於是愈來愈多的人落入「敵人」範疇。

傅鷹先被關在化學系男生宿舍。白天由該系女生監督在校園裏「勞改」，晚上由該系男生看管。連他因年老夜間多次上廁所，也遭學生斥罵。1968年他被關入學校「監改大院」。那裏一個當看守的女學生有個棒子。每天「晚點名」以後，這個女學生就在院子中間用她的棒子打東方語言系的副主任岑殿華，迫其承認曾經參加過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。岑殿華不承認。傅鷹看到這個情景說，按照劃定「歷史反革命」的「標準」，即使參加過「三青團」也只是「一般歷史問題」，現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認，說明她大概不會是。傅鷹教授的邏輯推理很是清晰。他說的這些話被報告上去，結果他為此也挨打。

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
1952年在「思想改造運動」中，曾在全校會上作為正面典型發言，1957年被劃為「中右」，文革中則成為「牛鬼蛇神」，遭到關押和毆打。傅鷹的身份變化，正顯示了劃分「敵我」的標杆不斷左移，愈來愈多的人落入「敵人」範疇。

(五)「右派份子」在文革中受迫害死亡比例極高

儘管未能追蹤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學「右派份子」在文革中的下落，但是觀察他們之中的小群體，可以知道他們在文革中受迫害死亡的比例非常高。

1952年，燕京大學外文系有四名英文教授在該年「院系調整」中併入北大。反右中，兩名男教授吳興華、胡稼胎以及兩名女教授俞大綱、趙蘿蕙的丈夫，都被劃為「右派份子」[◎]。(燕京大學共有五名英文教授，沒有併入北大的一位在其他學校也被劃為「右派份子」。)

文革中，這四名英文教授有三名被迫害而死，一名精神失常。兩名女教授的丈夫也都被迫害致死。

上文已經寫到吳興華教授被強迫喝污水而死。三個星期後，1966年8月25日，西語系紅衛兵在40樓前召開「鬥爭會」，俞大綱教授被強迫跪在台上挨鬥並被抄家。她當晚在燕東園家中服毒自殺。她的丈夫曾昭掄(劃為「右派份子」後被送往武漢工作)在武漢大學遭到「鬥爭」，曾被強迫在碎玻璃上爬行，於1967年12月9日死亡。趙蘿蕙教授的丈夫、考古學家陳夢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，1966年9月3日上吊自殺身亡。趙蘿蕙遭「鬥爭」和毆打，連西語系畢業留校的女助教都動手打她。她精神失常，需長期服藥控制。

胡稼胎教授被劃為「右派份子」後從二級教授降為六級，從此不准上課，先在校園作體力勞動，後到哲學系資料室翻譯資料。他有兩個兒子也被劃成「右派份子」。文革開始後他被「抄家」、「遊街」和「鬥爭」。1966年底他突然癱瘓，由妻子送去北醫三院。醫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。哲學系給醫院的公函上寫的是：該人是我系右派份子，請給予一般治療。他沒有能得到甚麼治療就出了醫院，1968年1月去世。

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，文革中不但「右派份子」首當其衝慘遭迫害，在北大領導了反右的負責幹部也遭到暴力迫害，有的受害身亡。江隆基是文革中最早的受難者之一。

二 反右領導幹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

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，文革中不但「右派份子」首當其衝慘遭迫害，在北大領導了反右的負責幹部也遭到暴力迫害，有的受害身亡。

1957年領導北大反右的，先是中共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長江隆基(1905-1966)。他被認為不夠得力，反右後被調往蘭州大學任中共黨委書記兼校長。文革中他成為最早的受難者之一。1966年，中共甘肅省委在中共中央發動文革的5月16日《通知》發出後，把江隆基列為該省的重點鬥爭對象。他遭到「鬥爭」，跪在高台上，頭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，被拳打腳踢，還被「遊街」。6月25日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他的「黨內外一切職務」。當天江隆基自殺身亡，時年61歲。

江隆基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共產黨，有長期的「革命」和「鬥爭」經驗。他在1956年被定為「高校行政一級」，是當時中國高校中級別地位最高的人之一。他並非如被指控的是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」的「三反份子」。但他既沒有申訴也沒有等待，很快就自殺，顯然是由於他了解革命的性質相當透徹。文革中全國大中小學領導人悉數被「打倒」，無一例外遭到「鬥爭」，有的甚至被活活

打死^⑩。他已經成為指定要被「打倒」的群體中的一名，那麼就像「土地改革」中的地主一樣，沒有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；如果不想繼續被打受辱，只有自殺。

1957年10月陸平(1914-2002)被派到北大取代江隆基。陸平在江隆基已經劃了500名「右派份子」的基礎上進行「反右補課」增劃了200名。這樣北大的「右派份子」就從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。此後到文革開始，陸平一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第一書記兩個職務。文革開始，毛澤東親自下令向全國廣播北大一張題為〈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〉的大字報，並把北大稱為「反動堡壘」。陸平成為全國聞名的「大黑幫」，遭到長期的「鬥爭」和關押。他曾經被吊起來拷打。學生還用高瓦數電燈強光照射他的眼睛不准其睡着，說這樣可以擾亂他的神經，迫使他「坦白交代」。

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、教務長崔雄昆，也是「反右派」的領導人之一。由於他曾在1964年反對陸平，文革開始後，他成為「左派」並進入新的北大權力機構核心，而沒有像其他北大領導幹部那樣被指控為「黑幫份子」。但是在「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」和「黨的核心小組」中擔任領導人兩年多後，他也遭整肅。1968年10月，他在校內紅湖投水自殺。

事實上，由於文革把整個教育系統指為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」，結果，那些在1957年領導了「反右鬥爭」並在此後執掌北大的領導幹部，除了極個別人士，都被「打倒」了。他們遭到心理和肉體的虐待及摧殘，而且根本無法自衛也無法為自己辯護，他們的境況一如九年前由他們經手「劃」的「右派份子」。

他們先揚後抑的經歷，帶着一種有強烈反諷意味的戲劇性，引人深思。遺憾的是，他們中幾乎沒有人分析他們的這種遭遇並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，甚至包括他們中最有學識和寫作能力的人。

例如，翦伯贊(1898-1968)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他在1937年加入共產黨，1952年起任北大歷史系主任、歷史學教授。1957年反右時他相當積極。筆者檢索《人民日報》發現，在反右高潮中，從1957年6月15日到10月19日四個月中，該報有九篇報導，述及翦伯贊在歷史學界、社會科學界、文物界的一系列反右會議上用嚴厲口氣「揭露」和「批判」「右派份子」。同時期該報上還有他寫的兩篇反右文章，一篇題為〈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歷史是為了革命〉(9月23日)，另一篇是〈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〉(10月4日)。兩篇文章攻擊歷史學界當時的兩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達，二人後來都被劃為「右派份子」。雷海宗1962年去世，時年55歲。向達如前述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。

1965和1966年，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多次點了翦伯贊的名字，把他作為學術界文革的重點整肅對象。報刊上指控翦伯贊「反對馬克思主義」的第一篇文章題為〈為革命研究歷史〉^⑪，竟與他1957年批判右派的文章標題同出一轍。罪名很快升級。從1966年6月開始，他在各種規模的「鬥爭會」上被「鬥爭」，最多時一天被「鬥爭」多達六場。「鬥爭」方式是拳打腳踢、坐「噴氣式」(即被強制作雙臂後舉大彎腰狀)。他被「遊街」、抄家及驅逐出原住房。分給他和妻子的一間小黑屋(在蔣家胡同三號院內)，是在兩排房子接縫處加建的，原來用於堆放煤塊等雜物，面積極小，到處漏風。他們在門口放一煤爐做飯熬藥，附近的孩子常來往他們的鍋裏吐唾沫和丟髒東西。

1968年10月底，在正式宣布劉少奇罪狀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上，毛

由於文革把整個教育系統指為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」，那些在1957年領導了「反右鬥爭」並在此後執掌北大的領導幹部，除了極個別人士，都被「打倒」了。他們的境況一如九年前由他們經手「劃」的「右派份子」。

澤東說，翦伯贊是「放毒的」，「要批」，也要「給碗飯吃」。會後翦伯贊從「牛棚」中被釋放，但迫害不曾停止。一個多月後，12月19日他和妻子戴淑婉在家中一起服安眠藥自殺。他們死於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」期間。那一「運動」中，在翦伯贊夫婦死亡前後，北大有34人被打死或者在遭迫害後「自殺」。文革的這一個「運動」在全國造成的死亡人數，比官方公布的全國劃了「右派份子」55萬的人數還多。原因之一是這一「運動」按照「規定」在全國每一個地方進行，手段也特別嚴厲和殘酷。

應該說，翦伯贊的死實際上包含有抗議的意味。但是在他簡短的遺書中，他沒有抗議他所受的迫害，相反，他寫的是「毛主席萬歲萬萬歲」。對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（那時文革已經開始兩年多），對1957年被他指控為「右派份子」的向達之死（那時向達已經被害死兩年多），對他充當了積極份子的反右和充當了被迫害對象的文革，對發生在他周圍的迫害和死亡，他作為歷史學教授卻沒有寫下片言隻語。這一事實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反右和文革的強大效果：不但毀滅了一批人的生命，而且摧毀了他們原本應產生的思想。

三 分析和解釋

（一）反右和文革是大規模群體性迫害

反右和文革在北大造成的數字巨大的受難者群體，顯示了二者都屬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。「右派份子」後來和別的「敵人」範疇並列為「地富反壞右」，又稱「五類份子」。在全國各地都要抓出這些「類」的「階級敵人」來。

上文展示了反右和文革在北大造成的數字巨大的受難者群體，顯示了二者都屬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。反右和文革都不是針對個人的，而是針對一些很大的群體。「右派份子」後來和別的「敵人」範疇並列為「地富反壞右」，又稱「五類份子」。一個「類」就是一個群體；而且每個「類」人數眾多，可以百萬計數。到了文革，在已有的「五類份子」之外，又加出了多個種類。例如，1969年北大一份題為《關於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情況報告》說，該年7月上旬到9月2日，在北大的教職員工中，清理出了「叛徒」、「特務」、「歷史反革命」、「現行反革命」和「地富壞份子」共102人。這份報告由毛澤東批示「照辦」後發給全國學習，編號為「中發（1970）17號」。也就是說，在全國各地都要抓出這些「類」的「階級敵人」來。北大三箇月中「清理」出的「階級敵人」數字佔教職員工的百分之二還多，在全國顯然會抓出一個極大的絕對數字。

除了立「類」之外，他們還預先制訂百分比或者各地人數配額，以確保實現總體效應。明顯可以看到，北大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人數比例劃了「右派份子」。後來「上面」傳下指示說北大劃百分之五不夠，北大就進行「反右補課」，增加到了百分之七。反右時毛澤東在幹部會議上講，北京大學的教授、副教授中，「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」^②。文革中毛澤東進而說，「北大是池深王八多」^③。結果不但如毛澤東所指示的在北大教員中劃了大批「右派份子」，文革中還把百分之十的北大正教授迫害致死。

在蘇聯檔案中存有一些關於殺人和關人的書面指令。1937年7月30日的一份，列出各個加盟共和國要殺的人數從100到2,000，同時還另外列出了數倍於此的要逮捕入獄的人數^④。這種事先規定迫害對象人數的指令非常恐怖：不但在於數字大，還在於其隨意選定要殺要抓的人數。

(二) 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級與擴大

上文列舉的事實表明，1957年反右的受害者，在文革中被推到火坑更深處，反右的領導幹部，文革中也被置於死地。這表明不但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，而且後者比前者更為嚴重。

不僅事實如此，從兩次「運動」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的理論中，也可以清楚看出。1957年，他創立了所謂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」理論。他把公民分為兩種，「人民」和「敵人」，至於誰是「敵人」一類，則由他規定。「右派份子」的「罪證」只是言論。按照當時的憲法，公民享有「言論自由」，但毛澤東說他們是「敵我矛盾」，上百萬人就成了「敵人」。毛澤東為文革建立了「繼續革命」的理論，也就是說，要把前面的革命更推進一層。在層層疊加的「運動」中，受難者愈來愈多、愈來愈慘。

上文第二節敘述了反右積極份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甚至致死。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，但是對此事實的解釋卻並不一致。有的人以此指責文革的「荒唐」、非邏輯，打擊了不該打擊的人。這一說法似是而非，因為這樣說多少等於肯定了反右，而且不符合事實。從最高領導人方面看，迫害對象群體層層擴大，但迫害原則始終貫徹，在邏輯上和行動上相當一致。

從理論到實踐，文革最高領導人的改變意向是清楚的。江隆基和陸平這些領導了1957年反右的人，即文革前的大學領導幹部，雖然從未擔任過大學教員，但至少他們自己唸過大學。文革一開始毛澤東就指控學校系統被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」，然後派送他的警衛部隊中的遲群、謝靜宜等沒有受完中學教育的人當了清華、北大領導人。在暴力迫害的同時，毛澤東有方向有步驟地改變着教育體制。

還有一種說法：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在文革中得到機會「造反」，反對迫害過他們的人。這種說法更為遠離事實。文革在「打倒」原學校領導人的同時，頒布了鎮壓右派份子的一系列規定。從北大案例可以清楚看出，文革中「右派份子」是受苦最多的群體之一，反右領導幹部被「鬥爭」也是出自文革最高領導人的指揮。

「右派份子」的「罪證」只是言論。按照當時的憲法，公民享有「言論自由」，但毛澤東說他們是「敵我矛盾」，上百萬人就成了「敵人」。毛澤東為文革建立了「繼續革命」的理論，也就是說，要把前面的革命更推進一層。在層層疊加的「運動」中，受難者愈來愈多、愈來愈慘。

(三) 這是一種甚麼罪行？

殺一個人，就是犯罪。殺害了數字如此巨大的人，侵犯了如此多的人的自由、人權，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殘酷懲罰了那麼多人，當然更是犯罪。

但是對於同一歷史事實，記述和判斷卻有很大不同。在反右和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那一邊，他們稱之為「偉大的革命」。直至今日，反右和文革的同情者津津樂道的是當時作為驅動力量一方的「理想主義」和高昂歡樂的情緒，他們迴避提及受害者一方的苦難，更不承認這是一樁罪惡。

在毛澤東死亡兩年以後，鄧小平和胡耀邦為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「改正」和「平反」，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翻案，在人道方面的功勞應該被記入史冊，當然也是因為發生過的迫害規模是前所未有的。他們不但承認了這個龐大受害者群體的存在，而且實際改善了受害者的生活條件。但是在說法上，

他們僅僅稱此行動為「糾正冤假錯案」。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事實，而且他們自己也並不真的如此認為，否則不會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一齊都平了反。

對反右和文革兩大事件，有一個問題是，應該把它們稱為甚麼樣的罪惡？顯然這是一種巨大的罪惡，然而既有的關於罪惡的名稱，謀殺、盜竊、投毒、誹謗等等，卻難以被用來指稱這樣的罪惡。反右和文革包含傳統意義上的這些罪惡，但是這些名稱只有很小程度上的適合，因為這些罪惡殺害和迫害的人數，都不可能與反右和文革相比。普通的罪犯，即使是系列殺手或者黑社會組織，都不可能危及如此巨大數目的受害者。只有戰爭會危害如此多的人口，但是戰爭主要由軍隊持武器進行，而且戰爭是兩軍對壘的衝突，有進攻有反抗，性質不同。

在現實中，沒有名稱的罪惡就可能不被認為是罪惡。反右和文革的罪行不但需要得到記錄，而且需要命名。

「群體滅絕罪」這個模式是否適合反右和文革？在人數上，顯然是的；在劃取群體類別方面，顯然也是的。上百萬名「右派份子」成為這一罪惡最典型的受迫害「群體」之一，數百萬名文革受難者也一樣。

在抵抗和清算希特勒納粹的漫長過程中，一位名叫萊默金 (Raphael Lemkin) 的語言學者，用其畢生精力創造並推廣了一個關於罪惡的新詞genocide。這個詞的前一半出自希臘文而後一半出自拉丁文。在萊默金和其他人的長期努力之下，「群體滅絕罪」成為在國際上被接受的罪名。「群體滅絕罪」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滅某一群體，包括殺害該群體的成員，造成該群體成員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，故意使該群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，毀滅其全部或部分的生命，強迫這一群體的兒童離開他們等等。這種群體，是基於政治、種族、民族、文化、宗教等理由劃分的^⑥。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行動，就屬於典型的群體滅絕罪。在那裏，被迫害、監禁、罰作苦役以至被殺害，最重要的「理由」(加上引號，因為這僅是作惡者一方如此認為的)是該人屬於「猶太人」這個按照民族劃分的群體。

這個模式是否適合反右和文革？在人數上，顯然是的；在劃取群體類別方面，顯然也是的。不同的僅僅是受迫害群體的名稱和內涵。上百萬名「右派份子」成為這一罪惡最典型的受迫害「群體」之一，數百萬名文革受難者也一樣。

(四) 歷史的審判

在反右五十年後和文革四十年後，在書寫和傳播技術如此便利的電腦網絡時代，已經有條件來做歷史的審判，也就是通過歷史寫作來審判罪惡。

這種歷史的審判是有意義的嗎？

文革後期，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在北大校園建立了一個「梁效」寫作班子，發表了大批文章，主要內容是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。例如，其中一篇文章題為〈略論秦始皇暴力〉(《人民日報》，1974年1月21日)，對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受到譴責的秦始皇大加讚美，並把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和文革「鎮壓反革命」直接等同，也就是說，要從歷史的高度來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體性迫害與殺戮。

現在回頭看這個曾經不可一世影響極大的「梁效」，也讓人思考另一個問題：在中國歷史上，能和秦始皇一樣大規模「焚書坑儒」的統治者，畢竟秦始皇以後的兩千多年裏也只出現過一個。是甚麼力量起了阻擋作用呢？應該說，兩

千年來人們把「焚書坑儒」當作罪惡來記載和譴責，這些歷史評判儘管以現代標準來說不夠深刻，卻多多少少起了作用。

這個歷史的縱向觀察告訴我們，通過歷史寫作對罪惡做出審判，從學術上對歷史事實進行描述和分析，雖然不能像在司法系統中審判罪惡一樣有力，但是並不完全無用。所以，對反右和文革做出歷史的審判，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義的。

註釋

- ① 方惠堅、張思敬主編：《清華大學志》，下冊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723。
- ② 唐少傑：〈清華大學文革中的「非正常死亡」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（香港中文大學·中國文化研究所），2006年2月號，頁56-64。
- ③ 王步崢主編：《北京農業大學校史，1949-1987》（北京：北京農業大學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212。
- ④ 本文所用的材料，來自我在過去十多年中對文獻資料的廣泛搜集和仔細閱讀，也來自我對大量經歷受難者的調查採訪。關於資料來源和研究方法，參見筆者所著《文革受難者：關於迫害、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》（香港：開放雜誌出版社，2004）中的〈前言〉。
- ⑤ 王學珍等主編：《北京大學紀事（1898-1997）》，上冊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），頁527、890。
- ⑥ 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四個現代化服務 北京市一批錯劃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，1979年2月3日，第4版。
- ⑦ 王友琴：〈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，2006年2月號，頁42-55。
- ⑧ 參見王友琴：〈摧毀「日記」的革命〉，網上季刊《黃花崗》，2006年第3期，www.huanghuagang.org/issue18/gb/17.htm。
- ⑨ Wu Ningkun (巫寧坤), *A Single Tear: A Family's Persecution, Love, and Endurance in Communist China* (New York: Atlantic Monthly Press, 1993), 67-68.
- ⑩ 王友琴：〈1966：學生打老師的革命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，1995年8月號，頁33-46。
- ⑪ 發表於《人民日報》，1965年12月8日，第5版。該文作者戚本禹不久後成為領導文革的「中央文革小組」成員。
- ⑫ 毛澤東：〈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〉，載《毛澤東選集》，第五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7），頁441。
- ⑬ 毛澤東的這句話在北大發生極大作用。1968年4月24日「北京大學首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份子代表大會」〈給毛主席的致敬信〉寫道：「敬愛的毛主席：您英明地指出：北大是池深王八多。這就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北大階級鬥爭的實質，敲響了北大一切叛徒、特務、地、富、反、壞、右、頑固不化的走資派的喪鐘。」《新北大》，1968年4月29日，第2版。
- ⑭ 這份殺人和逮捕計劃的原件照片可見於美國公共電視台PBS的一部紀錄片 *1917: Red Flag*，文件被翻譯成英文後收入 Anne Applebaum, *Gulag: A History* (New York: Random House, 2003), 95。
- ⑮ Samantha Power, *A Problem from Hell: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* (New York: Basic Books, 2002), 31-44, 61-85.

王友琴 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，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博士學位，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。著有《文革受難者》等書。